

现代性话语中的保姆故事 ——小说《芝麻》分析

刘希

(香港大学 比较文学系, 香港)

关键词: 现代性话语; 人口控制; 素质论

摘要: 当代女作家张抗抗的中篇小说《芝麻》书写女主人公芝麻进城打工并追寻城市现代性的个体经历。小说揭示了农村打工女性遭受的阶级和社会性别的歧视和不平等, 但是并没有彻底地揭示和拷问城乡社会中深层次的制度化和结构化的阶级、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层叠交织的权力关系。文本对城乡等级化差异的质疑最终让位于认可和强化了这种差异的“人口控制”和“素质论”的社会话语; 作者所声称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视角被更深层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话语和相应的文本策略深深地遮蔽了。文本最终被证明不是质疑而是强化了后毛泽东时代以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性话语。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3)04-0095-08

The 'Nanny'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of Sexuality: Reading Zhang Kangkang's *Sesame*

LIU Xi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Key words: contemporary discourse of sexuality, population control, the rhetoric of 'Su Zhi' ('quality')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write, Zhang Kangkang's novel, *Sesame*, is about the woman protagonist, Sesame, who migrated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an urban area to work and pursued an experience with city life. The novel reveals a woman rural migrant's experience with class-based inequality and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It, however, fails to expose and interrogate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intersecting, at a foundational level, the systemic and structural class-based gender inequalities in urban as well as rural areas. This paper questions that the notion of rural-urban divide ultimately makes way for or even reinforces such discourses as 'population control' and 'quality' of individuals. Zhang's claim of 'women's perspective' and gender's lens have been covered by the ideology of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ed strategy. In all, this paper proves that Zhang's claim does not question but reinforces the discourse centered on urba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in the post-Mao Zedong era.

新世纪之初, 著名女作家张抗抗以进城从事家政工作的农家女为题材创作了一篇中篇小说《芝麻》。^[1] 本文将探讨这个文本是如何在与现代性、城乡分割、社会阶层和性别话语的互动中形塑并编码进城打工女性的主体经验和认同的。作者身为一个

城市知识女性, 在她再现女主人公“芝麻”这个底层农村女性的流动和打工经验时, 运用了怎样的叙事策略、文本政治并勾连起相应的社会话语呢? 学者周蕾曾经在她的《社会性别与再表现》一文中谈及“再表现”的“立法的和政治的定义”, 她说表现的立

作者简介: 刘希(1983-), 女,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法和政治定义一旦同社会性别问题放在一起,就可能出现一个代理人的问题,即“包括所有权力政治,涉及在正式法律法规之外的场合代表别人说话的能力”;她认为,“我们需要质问的不是妇女如何被表现或她们如何被当作某些思想的代表,而是谁在从事这些代表工作,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在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女性时,表现者是描述性(descriptive)的还是指令性的(prescriptive)?他们是客观地描写事物还是将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强加于读者?他们是否不顾妇女自己的观点如何,只是代替她们说话?”^[2]因此,本文将考察《芝麻》中的女主人公怎样言说自己的进城打工生活,特别是寻求现代主体体验的过程的,也就是作家如何替这些打工女性代言,在这些代言中是否潜隐着作者某些关于现代性发展方案、城乡分割和社会性别等先在的假定和观念。

一、当代文学对农村女性的再现和小说《芝麻》

乡土社会和农民问题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性和民族国家话语所借重的重要题材和话语本身的构成框架之一。中国农村或者在部分五四启蒙作家那里被描绘成阻碍并威胁着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死地,或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被想象和赞颂为提供了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的动力的摇篮和基地;相应地,农民也交替地被塑造成等待被拯救和启蒙的落后、蒙昧、无助的“他者”或者善良、正直、有德性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化身和代表。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乡土中国经历着更深的现代性演进,变化中的农村、农民特别是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中继续成为重要的资源。

伴随着中国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并加入全球化进程,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大规模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农民进城务工、返乡题材的叙事日渐壮大,其中,变革中的乡村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成为这些书写显著的关切点。“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伤痕反思小说、寻根小说到80年代后期、90年代的新写实、新历史小说,实际上都在各自的立场上叙述着乡村女性,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乡土叙事、底层叙事的相继兴盛,乡村女性的形象更是缤纷出场。文学对‘乡村女性’的叙述已然成为现代性叙

事(包括对现代性反思)的重要符号资源。”^[3]作为农村中最严重的边缘人,当代社会底层中的底层,大量的对留守或流动的农村女性的描写都是被作为转型期“社会危机”的表现和症候的悲剧故事。后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的大潮带来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社会性别不平等、压迫的再次抬头,比起城市中中产职业女性,进城务工女性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在对她们的艰辛、不幸和创伤的大量现实主义记录之外,还有一些文本积极探讨了这些农村女性逐步觉醒的对抗地域、城乡、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自主意识。它们询问这些女性是否有可能从后毛泽东时代重构的社会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中解放出来,并在对这些不平等的揭露和反抗中展示自身的能动性。

澳大利亚学者杰华在她的《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中谈到,学者们曾经考察过中国的农民、女性和少数民族的“他者化”如何交叉作用和贡献于现代性和国家认同的精英或主流话语。她通过对讲述农家女故事的媒体和农家女自述的研究,发现“打工妹的形象是另一种‘他者化’的标志,围绕着她使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认同理念得以构成和延续。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话说,她代表着一种威胁国家的现代性计划并决定其面貌的‘被抛弃者’。同时她也是人们同情、娱乐和感兴趣的对象,还是为了保证现代性计划的成功必须让她加入其中并使其正常运转的主体”。^[4]现代性观念和话语紧密联系着那些城乡、阶层和社会性别差异性的话语,而《芝麻》的写作正是在这些差异性符号系统中展开,那么文本对底层女性流动经验的再现有着怎样的潜在意识形态和文本运作方式,有没有突破普遍的对流动农村女性的他者化编码呢?

《芝麻》再现了进城当保姆的河南乡村女性郭芝麻性别化的流动和打工经历。郭芝麻一家因为超生被施以重罚,芝麻为此来北京做保姆以期赚钱还债。因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芝麻需要每月去医院做孕检以证明她在外没有超生。芝麻的流动经验让她认识到城乡巨大的差别:物质生活、精神面貌、家庭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生育观和女性地位及自我意识。在这种巨大的对比下,芝麻被迫去追问何为有意

义的生活,女性有意义的生活选择到底是什么。她亲身感受到了“北京人不待见河南人”的事实,她不习惯城里处处要讲“规矩”,浪费奢侈的生活方式,并看到了居高临下的城里人雇佣保姆时的“不讲理”,质疑城乡“高低贵贱”的不合理。但是同时,她也因为有城乡巨大差异,一直反思着家乡穷困生活的根源。她逐渐认同了城市人把农村居民视为“落后”、“不文明”、“不现代”的观念,对她来说,农村和农业生活无意义且无出路。农村社会革新的关键在于农民能塑造一种“现代主体认同”。当芝麻被乡亲要求去替一个要超生的妇女做B超检查时,她虽然受到了来自乡村的“在乡里,人情就是法”的巨大压力,但她最终将家乡多年穷困、偷盗成风、教育落后的沉重现实归因于落后的生育观的阻碍,拒绝了为准备超生的杏儿“做假证”。“不管咋说,芝麻可不想给农村人丢脸。她不愿让刘伯伯一家人瞧不起河南人。这一回,她偏要跟赵庄的人较较劲儿。她好歹在北京呆了五年,她知道自己该咋办。”芝麻用这一举动证明了她对“农民精神、心态”的抛弃和现代主体意识的获取。由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在现代性话语中视为从“贫穷”、“落后”和现代化的“边缘”到“富裕”、“文明”和现代化“中心”的一场运动,她的经历便被文本编码为乡村女性追求城市现代性别个体认同的代表。通过城市打工追求生活条件的改善到通过摒弃乡土价值观获取现代主体认同,地理上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移达成了精神上对城市现代性的拥抱。

张抗抗曾谈及她这部小说的创作,她说这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即兴反应,希望能把像“芝麻”这样的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妇女的生活状态从“城市的缝隙里面拍出来”。“我们只看到农民进城这种现象,但我们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年,出来务工的农村人带回去了多少打工挣的钱,盖了房子,买了电视机,买了农具,他们开始一点一点改变了,最重要的是大量的进城务工的人毕竟还是学到了很多现代的文化和观念,比如说本来他的儿子十八岁就要定亲了,但是现在他觉得十八岁定亲太早了吧,他应该学技术或到外面去打工,他们的观念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的,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芝麻》真正想写的也就是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成长性的生活。”^[5]后来在《请带我

走》签售之后,张抗抗也再次谈到它,说《芝麻》写当下农村妇女进城打工的经历,她比较有意识地用“女性视角”观察和表现底层女性的生活形态。^[6]

这些主观意识再次确认了小说主题是芝麻如何作为一个乡村女性个体被现代化,并获得现代性别个体认同的。同时,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揭露了以芝麻为代表的农村女性进城打工时所遭遇的基于地域、城乡、社会性别和社会阶层地位的歧视和不平等,那么“成长性的生活”对芝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有没有指向一种从阶级、性别不平等中自我解放出来反抗意识呢?文本在叙述芝麻的故事中,表现出怎样的有关城乡差别、性别关系和认同,还有以市场经济城市化为表征的后毛泽东时代现代性的观念和话语呢?

二、“成长性的生活”:在农村的“落后”和城市“现代性”之间

小说在展现进城保姆的生活时触及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或者说是阶级分化的问题。芝麻和她的同乡们给城市家庭做保姆,遭到了种种基于地域、性别和社会地位的歧视和剥削,她们每天包揽了卫生、采购、做饭、看护老幼等全面的家务劳动,但她们被很多雇主看做是社会地位低一等的家庭佣人,经常遭遇不信任、不关心甚至无理的责骂。芝麻说:“出门在外,是个城里人就能训你”;朋友凤儿抱怨“城里的活儿再难也能学会,受气也不怕,看人脸色也惯了,就是吃不饱饭。那样有钱的一家人,三天两头给孩子买个玩具就好几百块咋就不让人吃饱饭呢?”除了被要求对家政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外,雇主们对这些保姆们最期待的表现就是她们听话、顺从、易驯服。有些雇主随意地使唤保姆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对于她们的权力。芝麻这群保姆在城市做家政常常失去尊严,在雇主/雇员的权力关系中处于附属和次要的地位。在芝麻遇到刘丹妮这家人之前,很多雇主都是不“讲理”的,她向丈夫抱怨说,“实话跟你说,出来打工的人,一个个就跟要饭的差不多”。芝麻还质疑了城乡分化和等级化的合法性:“这城里人和农村人,不都一样是人么?咋就有个高低贵贱呢?”

芝麻从农村到城市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自由,城市里非农业的家政工作没有

带给她劳动者的尊严和对他劳动的尊重。在城里,芝麻看到了城市居民对待农村来的保姆的冷漠和不关心也发生在城市居民彼此之间。芝麻看不惯城里人“机器”式的生活状态,“一家家那么些电器,把人都变得像个机器似的。芝麻也快成机器了”。相比之下,农村人的生活并不受这些机器的约束,似乎更自在些。

芝麻被刻画为一个朴素、善良、诚实、节俭的农村妇女,她无法完全接受并融入城市生活方式。她珍惜粮食,不能接受雇主刘丹妮扔掉剩饭,但雇主却认为她的节省“太农民了”。芝麻生活方式的节约和对粮食的珍惜来自于她跟农业生产和劳动密切的关系,她常常回忆起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种种困难、天灾、饥荒、劳作以及粮食丰收的喜悦。芝麻的个人回忆和感受中见证了从毛泽东时代集体所有制到改革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粮食产量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流露出对农村改革的认可。芝麻经常回忆起并且梦到自己从小围绕着粮食、土地、劳作生活的成长过程。她在对过去的叙述中维护了农民的尊严,肯定了体力、农业劳动的价值,而对农民和农业劳动的偏见和低估在以城市发展为重心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然愈演愈盛。芝麻雇主家的刘伯伯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他对芝麻的态度则跟其他家庭成员谨慎、小心、提防的态度不同。“刘伯伯是个老干部,说话办事可讲道理,他从不说不农村如何如何,只说‘基层’如何如何。”他对女儿说芝麻的工作不叫保姆,叫“家庭服务员”。“家里来了客人,刘伯伯给人介绍说:这是小郭同志。来人还伸出胳膊要跟芝麻握手。”刘伯伯作为一个老干部或老知识分子,他对芝麻和农村的称呼和命名保留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修辞和话语。这种话语认可农业生产对于国家建设的巨大意义,将农村“基层”看做工业发展的基础,宣扬各种职业之间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的同等价值,甚至农民的职业在一段时间中优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这种留存下来的社会主义话语与当下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和市场经济的现代性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新的话语的影响下,芝麻的体力劳动逐渐在她自己看来也是不重要、低等、无价值和无前途的了。芝麻认

识到城里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人家这一辈子不白活。你说咱家的刚和燕,能把书念下来么?将来别像咱这么活,好歹也有个事业啥的”。她唯一的期望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都能读完书,有了自己的“事业”。在芝麻逐渐改变了的“进步的”现代观念中,一个值得称颂并且有意义的“事业”其实指的是城市里白领的脑力劳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对于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已不再被认为能成为一名有意义的职业生涯。

芝麻为什么会认为“算来算去,还是到城里打工,比在老家呆着强”呢?小说交代了农村结束公有制后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提高的事实,但是不经意间也揭示了农村经济随后逐渐的停滞。“芝麻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啥从打嫁到喜树家,农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粮食打再多,卖完了刨去成本,就管了自个儿家的几张嘴。打下粮食挣不下钱,花钱还得指着用粮食去换。”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农村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关系调控中失去了原来的重要位置。社会学家严海蓉在《空虚的农村和虚空的主体》中谈到:“在改革时代,国家现代性的标志是转轨和接轨,使中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打入国际市场,国内服务行业的兴起,所有这些都靠着大量的流动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撑。这个重大世界观调整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一个以农村虚空化为代价,以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方向。这个双方面的过程从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几个层面展开。”^[7]尽管芝麻在城市里是一个边缘人物,忍受着看别人脸色和高低贵贱的阶层划分和歧视,但是芝麻逐渐还是接受了后毛泽东时代的这种城乡等级分割以及相应的脑力/体力劳动的优劣划分。严海蓉在研究后毛泽东时代家务劳动雇佣关系时认为,“劳力和劳心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社会分工,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分工体现了阶级关系”,她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中作为雇主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白领和作为出卖劳动力的家政工之间具有某些阶级关系的特点,^[8]而芝麻渴望子女脱离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与城乡分割紧密相连的脑体、阶级分化。

芝麻经常怀念在家乡生活上不被框定,相对自由。在城里做家政,她需要整天像机器一样服从和干活,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支配的时间。“兜儿里没钱是没钱,可日子过得自在着哩。喜树你是不知道,住人家看人脸色是啥滋味儿。”通过呈现芝麻的抱怨,小说潜隐地质疑了芝麻“商品化”自身劳动力所失去的对于身体的自主权。然而,尽管小说展示并探讨了城市和乡村的等级分化,它最终还是认同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重组的城乡关系,现代化方案中以城市为重心的现代性话语。在故事的开始,芝麻很厌恶城里人对农村人那种话语权力和暴力,她问为什么“是个城里人就能训你”。但是在故事的结尾,芝麻却开始接受了城里人的话语。在芝麻看来,城乡差距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更在于生活观念和个人选择。她逐渐认识到真正的“现代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并把她的农村生活看成不文明和落后的代表。虽然城市有种冷漠的面貌,但相比农村仍是“富足”、“文明”、“健康”的指征。她在雇主家学会了各种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和性别话语和词汇:“高科技”、“信息技术”、“法律”、“歧视”、“家庭暴力”甚至“正当防卫”。她学着获得现代认同,希望孩子将来有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的人生道路。这种心态正是作者所要刻画的“拥有现代观念的成长性生活”。

严海蓉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主流媒体和学术界从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看到的是解放和发展,尤其是农村青年一代的自我追求,看不到这是无奈的出走,而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城市目的论不断地把农村包围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意义表述体系中,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外,除了是空洞的‘传统’和‘落后’的代名词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上农村的虚空化。今天在城市里,‘农民’成了愚昧、无知和不文明的代名词。……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7]芝麻把农村看做落后和缺乏文明的代表所反映的正是现代性话语中的“城市目的论”,进城打工女性的对“在农村没有出路”的

说辞其实反映的是农民没有通往现代性之路。

芝麻拒斥农村、认同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家乡偷盗成风、道德沦丧的现象。“可老家没有电器,那日子又咋样呢?外头啥事儿不知道,吃了睡睡了吃,没吃的了就去偷,虽说不是个机器,可也跟个牲畜差不多。”芝麻试图把自己跟那些人划清界限,并把农村的停滞不前和落后归因于这种道德败坏、不学新知识、缺乏现代教育为表现的“农民性”。而这种“农民性”或者“农民精神状态”正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她急于打破她旧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特别是以多子多福为代表的旧的生育和家庭观念。小说安排她在进城后亲身经历“中国人有那么多”并引导她把农村的贫困和苦难的原因归结于农民违法计划生育国家政策的愚昧的超生。普遍的偷窃和超生现象本应作为乡土社会艰苦生活和农业生产低水平发展的症候和结果,但在芝麻的逻辑中,她却倒置因果,把道德败坏和落后的生育观看做是艰难停滞的农村生活的原因。

芝麻的逻辑和观念背后是一种改革开放后逐步增强的“素质论”的现代性话语。杰华认为在80年代之后,“素质”在中国已经成为有关现代性和国家治理的各种话语中的核心要素,“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素质的渴望与忧虑,与家庭和个体的素质竞争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基于自我规制和自我发展压力的强有力的政府治理形式,这些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加的压力,已经在普通人当中得到内化”。^[8]素质论和发展主义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素质一词或许兴起于八十年代早期‘优生优育’优生学话语语境中。广大农村人口成为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强烈焦虑的对象并成为严格的人口控制计划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数量庞大但素质低下的胆怯的农村人口阻碍了国家以改革开放与全球资本接轨的努力。太多的子嗣令农村家庭凄惨绝望穷困的形象愈加深重,不仅标示着农村人口的低素质、难以管教和缺乏现代文明和训导,而且更重要的是标示了他们缺少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急需培育的一种发展的意识(a consciousness of development)。”^[9]

芝麻看到了城乡发展巨大的不平等,但是她期望以提升农民素质的方式解决农村的穷苦和不发

展。素质论的特点在于它关注个体的缺陷和弱点远远大于揭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上的不平等。“‘素质’配置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集中关注人类的属性以及如何改善它们，将注意力从源自政府创造或认可的机构、制度和实践的缺陷和不平等中转移开。”^[9]素质论逐渐支配了芝麻的观念并搁置了她之前对于城乡差异的质疑。芝麻把低素质看做是由无知的生育观造成人口过度的后果，认为超生导致了农村人缺乏教育，生活窘迫却不思上进。“就是这么些个人，年年月月，除了种下那一亩三分地，成天不是打牌就是蹲墙根，连个广播都懒得听，活该受穷哩。芝麻恨恨地想。还一个劲地生生生，生下这么些人，一辈子啥见识没有、啥奔头没有、啥好日子没过上，生下个人来，这人究竟为啥活呢？……芝麻下辈子假如能重新活一回，肯定就不这么活了。至少不能像村里人活的那个样。”

尽管芝麻回忆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官员们种种暴力不人道的行为，但最终她把国家对人口的控制监管看做是解决农村人口低素质的关键。若城乡的素质差距能减小，那么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会随之打破，阶级的不平等也会被消除。“实现人口现代化”，“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等的官方人口话语占据了芝麻的头脑，遮蔽乃至消弭了她之前对城乡等级分化的抵触和抗拒。

人口控制是后毛泽东时代关于“进步”和“发展”的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是政府理性的一种方式，是这样一种国家逻辑：它以人口为对象，以社会的规范化为目的，而这种规范化就是以优化人口的健康福利和有用性为名义。”^[10]通过把农村穷困、匮乏和不发达仅仅归结于人口的过度繁衍，小说最终认同了以推崇“进步、发展”和“素质”为特征的城市现代性话语，并且接受了城乡的等级划分。这也就说明了《芝麻》这部涉及计划生育题材的作品何以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口文化奖小说金奖”。因此，尽管文本通过芝麻的个人经历生动鲜明地曝光和揭露了城乡的巨大差别和不平等，但它却提供了一个城乡差距的想象性解决的方案——严格遵守计划生育，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但并没有触碰农村超生、贫困、不发展的深层的制度性、结构性政治经济原因。

三、女性自主和自决：在农村父权制和国家生育政策之间

当农村女性流动到城市里打工之时，她们通常被认为拓宽了眼界，并且地理的变动和新观念思想方式的活动使她们有被赋权的可能，促使她们从家乡的父权权威下解放出来。作者曾谈到她在《芝麻》中有意识地用“女性视角”观察和表现底层女性的生活形态，关注芝麻性别认同和性别意识方面的变化。芝麻从她的流动打工经历中不仅仅获得了个人经济独立，提高了家庭地位和决定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了维护女性自身权利和性别平等观念的重要性。空间上和夫家的距离，新获得的法律知识和话语权力，都鼓励着芝麻反抗自己家庭中的压抑性的男权思想和做法。女性的自主性也是作者表现新时期中国农民观念的变化和新农民的成长问题的一个关键点。逐渐生长的“女性自我”促使芝麻反对家庭暴力，争取在家庭事务中的平等决定权，同时去反思农村生育观念中的性别歧视。

在叙事中，芝麻的性别主体性最关键的体现即是她认识到女性应该拥有生育权，即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充分的自主。芝麻在第二胎的生育上完全被夫家所决定，自己的意见被无视而不予采纳。当芝麻在雇主家中向大家抱怨因为超生自己家庭遭受的过分的惩罚时，李阿姨说这事怨不得别人，只怨芝麻自己。这促使芝麻去思考女性权利的问题。最后，芝麻拒绝帮助同乡杏儿孕检，并且埋怨杏儿被迫在生育上一味屈从，没有任何自主性和自决权。“杏儿咋这么没主意呢，你男人让你生你就生啊？”芝麻在心里骂杏儿，“你就是把孩子生下来，又是个闺女你咋办？孩子生下来，好几万块钱的罚款，你拿啥还哩？孩子要吃要穿将来还要上学，养活三个孩子，以后受苦的还不是你自个儿？生生生，农村的人就知道生，生那些孩子有啥用？……一个村儿的人都这么稀里糊涂地过，还想生，生你个×！”

但是从芝麻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她在生育上性别意识的觉醒又是跟她对超生造成农村贫困的观念分不开的。当芝麻的河南同乡们取笑村里那些进城打工的保姆们通过服侍城里人赚钱时，芝麻非常生气，但是在她对他们“一辈子啥见识没有、啥奔头没

有”的谴责中,我们看到的是素质论的影子。男性村民们问芝麻当保姆时是否“受气”,并且取笑村里其他做保姆的人“天天给人洗屁股挣下的钱”。这些村民并不认可村里的女人们通过做保姆给家庭收入作出的贡献,把她们在城里的家政工作看做是不恰当、耻辱的和不可忍受的。这些轻视的态度或许因为村民认为村里的女人去伺候其他外族的(男)人形成了对夫权的一种挑战,这是一种男性中心的性别歧视的文化。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村民看到女人去服侍城里人,如果把保姆这种职业跟旧社会的仆人联系起来,似乎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城乡阶级关系,那么他们的嘲笑和不屑或许也可以看成是对服侍更高的社会阶层的劣势地位的一种排斥。

可以看出芝麻的回应完全没有看到其中或许隐含的对“阶级地位不平等”的不满,她的厌恶部分出于作为一个女性对男村民的这种歧视性态度的反对,但更多地是把他们不尊重归结于他们“素质”的低下。在此,芝麻这个女性流动者的“成长性生活”以她对现代性话语的完全肯定为标志,这导致她最终对人口控制和监管的国家政策的完全拥护。可以说,芝麻的这种把歧视理解为没素质、缺乏教育、人口泛滥的想法在社会性别和阶级/社会阶层的视角上是不充分或者说是盲目的。与其说芝麻没有顶替别人孕检是对女性生育自决权的认识,不如说是对多子造成农村孩子素质低下的忧心,对严格的计生惩罚制度的恐惧,还有对“优生优育”为特征的城市现代性的向往和靠拢。性别间、城乡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叙述中并没有被充分地追问和质疑。

在农村贫困的问题上,文本不仅无法公正全面地探讨,更是遮蔽了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转变过程中城乡发展方案的变化,另外还有深层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原因。根据学者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的研究,中国农村像“多子多福”这种生育观念或许并不仅仅是传统父权制文化的产物。“通过把求多子尤其是多儿子这种偏好标明为源于‘过时的’和‘封建’的思想,这种话语取消了探讨有可能不经意地造成了这些观念的各种当代力量的可能性。重要的形成这种生育决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在官方话语中被漠视了。”^[10]把乡村的不

发展仅仅归因于过量人口既表面化又武断,造成了文本和国家人口话语的共谋。

文本构建的芝麻的“自主性”在文本结尾更加可疑。当芝麻在不愿帮人作弊和公婆、乡亲的极大压力下挣扎时,是芝麻的丈夫喜树突然间对芝麻的赞同和支持帮她抗衡来自乡村家长制的压力。丈夫的允许在文本中极大地弥补了叙事上的紧张。可以说,芝麻抗争的成功靠的是摒弃农村落后观念而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并最终得益于丈夫的允许。

总之,《芝麻》中的社会性别话语跟现代性和发展主义话语紧紧纠缠在一起,而作者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视角可以说被更深层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文本策略深深地遮蔽了。

四、结论

很多学者注意到不仅仅是阶级或城乡分割,而且社会性别“也成为现代性被想象和渴望所借助的核心形态之一”。^[11]对农村女性流动经验的再现正是在现存的社会性别话语、城乡差异话语和它们与现代性的交缠关系中展开。作为一个他者化的重要符号,乡村女性成为“为了保证现代性计划的成功必须让她加入其中并使其正常运转的主体”。^[12]通过追溯芝麻从河南乡村到北京的流动打工经历,小说揭示了芝麻以及和她一样的进城保姆们在家乡和城市遭遇的性别和阶级上的歧视和不平等。芝麻在小说开始对她过去的农村生活既怀念又疏离的态度让她有了一种“中间人”心态,这种心态也就成为了社会转型和危机的症候。然而随着叙事深入,芝麻开始积极锻造其现代性别认同主体,她再次回望河南农村和农民的眼光,被加入了对素质论、发展论和城市优越论的认同。芝麻的转变和“个人成长”以她最终对农村落后、愚昧、被动的反面——城市现代性的拥护为标志。

可以说,芝麻这个主人公并没能逃离被他者化以保证现代性计划成功的命运。把农村、农民看做蒙昧、不文明的他者的先在观念在文本中并没有被有意识地审视或质疑,因为文本无法在后毛泽东时代现代性方案之外给农村社会想象出一个别样的未来。文本一开始对城乡差别的本质区分所作的质疑随着叙事深入最终让位于重写和增强这种城乡差别

的素质和人口话语。

作者有意识从女性性别视角去书写芝麻面对性别不平等和乡村家长制自主性的女性自我生长的过程,但是文本对主流人口话语的认同最终抑制了其女性主义主张。女性打工者们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期的所有性别和阶级问题,都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农民素质上找到了它们想象性的解决。如何让农村在城乡、社会阶层、社会性别关系平等均衡而不是在深层社会阶层再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富足和繁荣是《芝麻》无意中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乡村社会还是城市,深层的制度化和结构化的社会阶层、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层叠交织远没有被彻底地揭示和拷问。

对于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在乡村父权制下牺

牲和在市场经济中把自身劳动力商品化之间的进城打工女性来说,她们对女性自我的追寻必定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学者邵明在考察了当代小说“农民工”书写后发现,“在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进程的普适性价值日益获致广泛认可的总体历史背景中,任何现代性之外的社会建构想象都已无法获致合法性意义。……文学话语便与社会现代话语达成高度的同质性,并在参与建构社会个体市场意识的过程中具备特定意识形态表达的内在本质和局限性”。^[12]可以说,《芝麻》对进城保姆经验的再现经过了作者先在的社会文化观念的调节和过滤,文本最终被证明不是质疑而是强化了后毛泽东时代以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性话语。

[参考文献]

- [1]以下引文皆出自张抗抗《芝麻》[A].鸟善走还是善飞:张抗抗近年中短篇小说[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 [2]Rey Chow.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A]. *Feminist Consequences: Theory for the New Century*[C]. Ed. Bronfen E. and Kavk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王宇.现代性与被叙述的“乡村女性”[J].扬子江评论,2007,(5).
- [4][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5]张抗抗.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EB/OL].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470018.htm>P95. 2003-12-21.
- [6]张抗抗.谈创作:注重性别走出圈眼[N].中国妇女报,2003-11-21.
- [7]严海蓉.空虚的农村和虚空的主体[J].读书,2005,(7).
- [8]严海蓉.“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J].开放时代,2010,(6).
- [9]Yan, Hairong.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Neohumanism: Organizing Suzhi/Value Flow through Labor Recruitment[J].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3,18(4).
- [10]Greenhalgh, Susan. Planned Births, Unplanned Persons: 'Population'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Modernity[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3, 30(2).
- [11][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12]邵明.伤痛中的现代渴望——近期小说“农民工”书写的意识建构功能[J].理论与创作,2006,(5).

责任编辑:含章